



中国国际 战略评论

2014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 | | |
|-----------|--------------------------------|
| ■ 戴秉国 | 为国家策 为万世谋 |
| ■ 王缉思 | 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
| ■ 归咏涛 黄楚云 | 中日关系恶化的历史背景与症结所在 |
| ■ 姜 毅 | 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若干问题 |
| ■ 沙纳尔 文安立 | 欧盟同亚洲的接触 |
| ■ 徐弃郁 | 历史的重读：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启示 |

中国国际 战略评论 2014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14 / 王缉思主编.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012-4695-3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国际形势—研究—2014 ②对外政策—研究—中国—2014 IV. ①D5 ②D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34803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封面设计

袁路明
赵 玥
陈可望
田 林

书 名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4

Zhongguo Guoji Zhanlüe Pinglun 2014

主 编

王缉思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 × 1092毫米 1/16 23¼印张

字 数

520千字

版次印次

2014年7月第一版 2014年7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695-3

定 价

53.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卷首语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自2008年创刊以来,以年度报告的形式,跟踪、分析、评论了国际战略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现在献给读者的是第七个报告。同前六期不同的是,原主编单位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于2013年10月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网站 www.iiss.pku.edu.cn),并成为一个实体科研机构,内设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我们希望这个研究机构能够成为立足于北京大学的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智库,服务于涉及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为社会各界提供相关领域的客观分析。我们也希望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能够为中国的国际战略谋划提供一些参考。在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和外文出版社的支持下,自2012年开始,《评论》还出版英文版(*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为海外读者了解我们的观点和研究现状打开一个窗口。可喜的是,《评论》中英文版都获得了读者一定的认可度,使我们有信心将这个系列年度报告办得更好。

2013年以来,国际战略形势和中国对外关系都发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各种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世界经济的复苏主要靠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带动,但新兴经济体发展方式转型进展不大,而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约、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发达国家的过度经济刺激政策,都必然会使新兴经济体的成长付出更高的代价。长期的低速增长,似乎已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常态”。欧洲、日本、俄罗斯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的风险,经济民族主义的上升,也给各国经济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比国际经济秩序变化更剧烈的是国际政治秩序。乌克兰国内政治危机引发了以欧洲和美国为一方、以俄罗斯为另一方的国际地缘政治争斗。在危机中,俄罗斯借机将克里米亚并入自己的版图,乌克兰其余部分也面临分裂的严重威胁。令一些观察家不解的是,美国虽然联合欧洲对俄罗斯进行了口诛笔伐和经济制裁,却没有显出阵脚大乱的态度,也没有对俄罗斯施加明显的军事压力,而是继续实施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

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明显比前些年更趋于紧张。中国观察家普遍认为,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调整是亚太安全形势复杂化的主要原因;以安倍晋三首相为代表的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当政,企图否认二战侵略罪行,联美反华,企图突破

和平宪法约束，造成东海局势紧张；在美国的怂恿下，菲律宾和越南挑战中国的海洋权益，造成南海局势紧张。美国、日本和其他某些国家的政府和舆论则把近年来的亚太安全忧患归罪于中国的“强势崛起”，质疑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意图。意味深长的是，中美两国和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一致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原则，担心朝鲜铤而走险，进行第四次核试验、远程导弹试验或挑起军事冲突，也担心朝鲜政局突变引发“溢出效应”，影响半岛的安全格局。

对上述变化的是非曲直做出价值判断，不是本书编辑者的主要责任。我们更关心的是：俄罗斯同美欧围绕乌克兰问题的紧张关系，中国同美国及其少数盟国在西太平洋的对垒，是否标志着冷战结束后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起点？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个新阶段的特征应当是传统地缘政治的回归，对传统安全（特别是领土归属和军事安全）问题的关注再一次压倒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生态环境、气候变化、食品安全、非法移民、走私贩毒，等等）的关注。于是，整整100年前爆发的世界大战的情景，就不再是完全的历史记忆，而会成为高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Sword of Damocles）。

中俄结成军事同盟暂时不会成为现实，但难以否认的是，传统大国关系的逻辑正在把这两个国家挤压在一起。在两国同时面临外部安全压力和西方政治渗透的危险的时候，两国全面加强战略协调与合作，便成为理性的选择。世界政治格局不是单极，也不再像多极，而像是中俄为一个权力中心、美国及其盟国为另一个权力中心的“两极世界”。

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治国理念，当前的国内社会环境和心态，经济增长趋缓的压力，以及暴恐活动的增加，都产生了进一步加强政府管治和干预的冲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成为最受中国公众推崇的外国领导人，绝非出于偶然的个人因素——中国人开始向往“强人政治”和铁腕外交。在国际上，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军事实力也明显增强，在某些方面已经可以傲视周边甚至美国，因此中国外交战略做出重大调整，似乎势在必行。调整的方向，是在外部压力面前不服软、不轻易妥协退让，甚至主动出击。

另外，中国迅速拓展的海外贸易、投资和金融市场，对外部能源资源的获取，对新技术的借鉴吸收，都需要稳定的全球环境和大国合作。“两极世界”同经济全球化背道而驰，也同现存国际经济秩序不相兼容。毕竟俄罗斯经济离不开欧洲，中国也不愿看到对日经贸关系下滑。中俄加强战略合作，却无法取代各自同发达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

此外，尽管西方式代议制民主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遭遇了挫折和批判，连美国自身的民主制度也饱受诟病，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周边的印度尼西亚、缅甸、阿富汗、蒙古等国家，还是至少在形式上接受了多党民主制。冷战时期那种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经济体系的“两极”，在当今世界不会重现。世界各国政治体制呈现多种形态的民主化，成为一个长期趋势。与此同时，民族宗教

问题还将长期困扰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使地缘政治的板块难以固化。因此，断言冷战后时代出现了一个回归地缘政治冲突的新时期，也许还为时尚早。

我们的国际战略研究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对各国社会和全球趋势需要更深入的了解，才能做出更为明确、冷静而全面的事实判断和政策建言。历史证明，崛起大国比其他国家更容易犯颠覆性的错误。中国面临着重要的战略机遇，但也必须避免陷入前进道路上的陷阱。我们编写这个系列年度报告，志在广开言路，在战略研究中提供更丰富的观点，以便做出更好的选择。

王缉思

2014年6月

目 录

特 稿

为国家策 为万世谋

戴秉国

1

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王缉思

4

专题：聚焦日本与中日关系*

*** 令人担忧的安倍晋三政权**

王新生

17

***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研究**

刘 华

26

*** 中日关系恶化的历史背景与症结所在**

归泳涛 黄楚云

39

*** 当前中日关系中的危机管控问题**

于铁军

51

* 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	62
张玉来	
* 变化中的中日经贸关系：“政冷经热”时代的终结？	78
〔日〕渡边紫乃	
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若干问题	94
姜毅	
中俄角力在蒙古	104
〔俄罗斯〕谢尔盖·拉钦科	
从购买国债到直接投资：中国对美金融战略的新方向	115
宋国友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影响的定量分析 ——一项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	125
马骏 肖明智 施 娱	
进一步夯实中国与东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	150
杨保筠	
中国在拉美的经济存在：大不能倒？	160
郭 洁	
缅甸转型过程中的动力与博弈	178
翟 崑 宋清润	

浅析印度崛起的制约因素	192
楼春豪	
阿富汗战争改变了什么?	203
钱雪梅	
“后反恐时代”阿富汗的重建:关于中亚国家作用的探讨	220
吴大辉	
伊朗核问题谈判及前景展望	232
李国富	
总统选举与叙利亚局势走向	245
王锁劳	
俄罗斯(苏联)中东政策的演变	257
吴冰冰	
美国对东亚多边主义的新热情? ——论奥巴马政府对于东亚地区一体化的认知	273
张 云	
欧盟同亚洲的接触	284
[英] 玛丽·朱莉·沙纳尔 [挪威] 文安立	
“金砖国家”在失去金色吗?	297
赵明昊	
美国的页岩气:繁荣抑或泡沫?	307
[美] 盖尔·拉夫特	

中美网络安全战略博弈：现状与展望	317
朱启超	
美国亚太反导系统对中国安全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	331
吴日强	
历史的重读：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启示	349
徐弃郁	

特 稿

为国家策 为万世谋

戴秉国

大家好！很高兴以一名外交战线老兵和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名誉院长的身份参加今天的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成立大会。在座有不少都是国际战略方面的专门家、大学者。过去的几十年里，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和国际战略方面专家学者们接触不少，从你们身上吸取了许多有益的营养。现在我退休了，可以有更多时间向大家请教了。

首先，我要对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的成立表示衷心的祝贺。多年来，北大在国际问题研究和教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各涉外部门以及国外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为我国乃至世界各国培养了一批外交领域的专门人才。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的成立，必将为我们国家国际战略研究的拓展、为我们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建设道路作出新的贡献。

第二，我以为，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的核心是在“战略”二字。“战略”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战略方向正确与否决定着一项事业的成败乃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比如，历史上，秦惠王向南并吞巴蜀而一举奠定秦王朝最终实现大一统的地缘政治和物质基础，而明太祖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却使得中国在原本相对领先的条件下错失了实现近代化的契机。世界范围内，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一之后继续把重点放在自身发展而不是对外扩张上，从而为其在二战后正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奠定了坚实基础；相反，日本等一些国家走上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则把世界和他们自身带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戴秉国 原国务委员、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名誉院长。

此文系戴秉国同志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稿，原文发表于《当代世界》2014年第4期，经《当代世界》同意，在本书重新刊发。

“战略”也是各主要大国统筹内政外交、凝聚力量和人心的重要手段。战略意味着方向。大家知道,“海权论”的提出迄今仍在影响着一些国家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冷战时期,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在冷战的的不同阶段先后推行了一整套战略,而万变不离其宗的目的就是调动一切资源、采取一切办法去和苏联对抗、争霸,直到把苏联搞垮。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又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和需要,在小布什总统时期搞了反恐战略和大中东民主改造战略,2011年奥巴马总统时期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近年来,布热津斯基还提出了“大西方”战略。

“战略”问题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思想根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华文明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战略大师,远在春秋时期,孙子就提出“上兵伐谋”的思想,开宗明义地阐明了战略的重要性。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无论是雄才大略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无论是辅佐汉高祖夺取天下的张良,还是妇孺皆知的诸葛亮,他们的思想之光直到今天,依然沐浴着我们中华民族,并丰富着人类文明的宝库。我的家乡在贵州,明朝的开国谋士刘伯温曾预言: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500年后看,云贵赛江南。看看今天西南地区奋力追赶的发展态势,谁不赞叹刘伯温的战略远见呢?!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作为一个文明底蕴深厚、历史传承历经几千年不间断的大国,我们新的历史时期迎来了实现两个百年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八大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重申了我们走和平发展道路、推进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战略的决心。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北京大学成立国际战略研究院、加强战略研究可谓恰逢其时,尤其要在“战略”二字上下功夫,想长远,谋全局,出实招。

第三,今天,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的成立只是一个开端。下一步怎么走,能够走多远,还需要北大的各位同志做好顶层设计,抓好各项执行,付出艰苦不懈的努力。而万事开头难,始创的这几步尤为关键,一定要争取用两三年的时间打拼出一个比较好的局面来,为研究院的长远发展奠定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为此,我想谈几点看法和建议,供大家参考。

一是不务虚名,但求实效。如何建成一个高端的智库?我以为,这个高端智库的起点和定位决定它能够走多久、走多远。起点高则视野宽、思路广;定位准则方向明、干劲足。所谓智库,我理解它的主要产品就是思想和政策建议。这就意味着,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如果想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方面进行一些有益的尝试,就不仅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基础性研究工作,更要关注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和外交工作的实际需求,及时把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性建议,为中央、为外交工作提供智力支持与决策参考。面对时代潮流,特别是瞬息变化的国际形势与火热的外交实践,我们已经不可能“躲进小楼成一统”、为做研究而做研究了,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要生存、要发展,特别是要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是

树立“为国家策，为万世谋”的胸襟和远大理想，扎扎实实地做好规划，认真真地去研究一些大问题。

二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21世纪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是人才。有研究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南部和西部被称为“阳光地带”的部分城市由于吸引了大批高科技人才的聚集而实现了经济在逆势中的快速增长。这充分表明了人才对于事业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怎样才能够把国际战略、国际关系领域的大师们、人才们吸引到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的门下，做研究、提建议、出精品呢？这就需要北大的同志们，特别是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的同志们做好制度设计，不仅把北大校内人才的聪明才智凝聚起来、充分发挥出来，还要把国内的，甚至国际上的人才吸引过来，把他们的智慧挖掘出来。

作为北大这所高等学府的国际战略研究院，我想是不是还应担负起培养人才、培育大师的责任。我们说大学非大楼之谓，而是大师之谓。延安的窑洞孕育了共产党的一大批领袖，新中国从西柏坡简陋的环境中走来，西南联大的师生们顶着敌机的狂轰滥炸、住着茅草和泥土筑成的陋室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各领域的大师与精英。我们今天条件好得多，但为国家发展、为外交事业培养人才的任务却也更加紧迫，因为我们已经提前走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各方面的准备，特别是人才的储备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希望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的成立，在吸引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战略思维的高素质人才方面也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

三是开拓创新，确保可持续发展。前几天，我见到一位美国朋友，我问了他一个问题，美国建国不过二百多年就发展到了今天这样的高水平，有什么秘诀没有？他回答说，如果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创新。我以为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生命力何在？很重要的就是创新。作为新成立的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更需要在组织架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成果形成、评估与转化，人才吸引、培养与保障等方方面面推陈出新、开拓进取，这样才能够确保国际战略研究院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

最后，我想再次对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祝贺，也希望，在各部门、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与共同参与下，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能够办出高水平，办出竞争力，办出影响力，同时也办出感召力，最终成长为一个具有国际国内影响的智力平台。

谢谢大家！

特稿

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王缉思

2012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多次倡导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其界定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并且得到美国奥巴马政府的积极回应。中美两国战略决策高层都意识到，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关键是要破解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这一“魔咒”。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美关系曾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严重冲突与对抗，包括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热战”，台湾海峡的对抗，政治意识形态的冷战，以及经济、文化、外交的相互隔绝。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上海公报》发表以来，中美关系虽然出现过若干次严重危机，但从未出现过长期激烈的战略对抗，发展基本上是平稳的。如果不冲突不对抗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本质特征，那么它的雏形已经出现了。同时，近年来两国政府高层已经就中美应当而且必须避免冲突与对抗达成了共识，而且这种共识是40多年来历代中国领导人和历届美国政府用不同方式、不同语言反复表达的。值得深思的是，为何中美关系经过长达40多年的稳定发展，以及两国领导人关于避免对抗、发展合作的无数次宣言，仍然有不少国际舆论和两国国内有影响的人士，认为中美两大国最终会走上冲突和对抗之路？

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今天提出“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命题的原因何在，意义何在？本文还想回答的问题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标准是什么？其建立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中美两国需要做出哪些各自的和共同的努力，才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一、中美对抗的魔咒为何日益逼近?

从战略研究的角度考虑,为何中美冲突与对抗仍然是一个魔咒、一个未来选项和可能性呢?在思辨意义上,存在着以下几种可能。

第一,两国领导层并不相信或不完全相信对方的战略保证,即中方不能相信美国关于“一个稳定、强大、繁荣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的说法代表了美国领导人的内心想法,而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是“遏制、西化、分化”;美方不能相信中国关于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将美国排挤出亚太地区、不同美国争霸的说法是真心话,担心中国“韬光养晦”的思想反映的是在当下中美实力差距仍然巨大的条件下的一种策略算计,而不是长远的战略考虑,一旦中国羽毛丰满,就将挑战美国霸权。这就是所谓中美战略互疑。

第二,许多研究者和观察者不相信中美官方所表示的不相互冲突对抗的言论有足够的实际意义。他们可能认为,两国政府高层所表达的意愿即使是真的,也不一定能够掌控和改变两国关系走向对抗的长期趋势。有的中国人认为,由于美国的目标是竭力遏止中国崛起,中国只有牺牲自己的核心利益,屈从于美国,才能避免对抗,而这是中国绝对不能接受的。反过来,也有美国人说,只有美国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听任中国政府在国际国内为所欲为,才能避免跟中国发生冲突,但这是违背美国立国之本与根本利益的。这种断定中美关系本质上是零和博弈的想法,在一部分社会精英中根深蒂固。

第三,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道路的根本差异,使两国关系渐行渐远。孔子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两国关系在表面上取决于两国政府如何处理双边和国际问题,其实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是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两个大国究竟是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是合作维护和改革完善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还是各自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和利益去划分有形或无形的势力范围。用形象的语言来说,就是究竟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还是“同床异梦”,将世界一分为二?这种思路,是“制度决定论”的一个延伸。

上述三种思辨意义上的可能性,部分已经成为现实,至少成为两国部分政治精英的现实考虑。之所以出现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议题,就是因为两国分别出现了战略互疑、零和博弈论、制度决定论等种种对中美能够避免冲突对抗的怀疑,而且这些怀疑是以理性而不是非理性的推论为前提的。一个理性的推论,来自于国内凝聚力的需要。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思想家孟子就指出了“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道理。对当代中国来说,美国是最大最明显的“敌国外患”,在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语境中似无疑义。已故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说:“对于美国来说,理想的敌人该是意识形态上与己为敌,种族上和文化上与己不

同,军事上又强大到足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可信的威胁。”¹由此可见,两国都有理由把对方视为“理想的敌国”,用以唤起国内的忧患意识,激发爱国主义,提高民族凝聚力,加强社会稳定。在某种意义上,同对方的冲突对抗,至少是局部的紧张关系,不仅有思想基础,而且有一定的物质利益基础(比如美国的军工利益集团)。

如果把这三种思想因素和物质因素比喻为长期高悬于中美关系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Sword of Damocles),那么现在这把剑掉下来的可能性正在增加。我们至少可以指出五方面的新因素,来说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紧迫性。

(一) 中美实力对比日趋接近,世界政治格局变化显著

今天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是因为近年来中美之间的实力天平迅速地向中国方面倾斜。2003年,中美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为1.4万亿和10.9万亿美元,中国GDP只有美国的12.5%左右。2013年,中国GDP超过9万亿美元,占美国当年16.79万亿美元GDP的55%左右。²中国国防开支迅猛增加,军事力量增强的趋势令人瞩目,而美国国防预算近年来被迫缩减。无论如何解读国内生产总值和军费数字,中美两国硬实力迅速接近,是不争之事实。许多研究机构得出的结论,都是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30年或更早的时间里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迅速扩大。在全球治理机制的结构性转型中,中国逐渐进入二十国集团(G20)等机制的权力中心。

与此同时,十几年以前的中国舆论普遍担心美国的战略扩张势头和建立单极世界的图谋,而今的舆论导向是美国霸权风光不再,软硬实力同时受到削弱。在世界范围内,“金砖五国”各自力量的上升和相互合作成为国际政治的新特色。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包括欧洲主要国家和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整体实力和影响下降,许多非西方中等经济体作为一个群体,其全球权力十几年以后将超过欧盟和日本。如果将政治世界分为“西方”和“非西方”,那么全球政治力量的天平也在向中国倾斜。美国在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位子上稳坐了100多年,在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上稳坐了20多年,其面对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实力地位上升所形成的挑战,不可能不做出重大的战略和政策调整。中国在整体实力和世界地位上升

1 [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页。

2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4年2月24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经初步核算,201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568845亿元人民币,按照现行汇率核算已经超过9万亿美元。该统计公报全文可见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美国GDP的数字来源为商务部的国民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BEA)官方网站2014年3月27日发布的美国经济情况报告,参见<https://www.bea.gov/newsreleases/national/gdp/gdpnewsrelease.htm>,2014年4月16日登录。

的新形势下，对外战略和政策的调整也势在必行。

（二）两国的政治分歧愈发明显，意识形态斗争日趋激烈

40多年来，一部分西方战略家和知识精英一直抱有一种幻想，即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最终将走向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政治，中产阶级的增加将导致“公民社会”的成长，市场经济的扩大将削弱国有企业的实力，等等。近年来，特别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这种幻想逐渐破灭。与此同时，美国人越来越担心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和经验（“北京共识”）对美国式民主和美国倡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华盛顿共识”）构成挑战，从而从根本上冲击美国试图主导的冷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美国战略家亨利·基辛格揭露道：“新保守主义者及其他激进分子认为，民主体制是互信关系的前提：非民主社会在本质上是危险的，倾向于使用武力。……与非民主社会打交道，政权更迭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最终目标。与中国相处不是一个战略问题，而是改变中国治理方式的问题。”¹

时下中国的一个主流观点是：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大变革大调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西方把中国崛起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进行渗透。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否则最后必然会出大问题，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当年苏联亡党亡国、东欧剧变，这几年来中东、北非国家动荡战乱、政权更迭，都足以让中国人深思。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和西方咄咄逼人的态势，尤其是西方动辄对中国政治体制、经济形势、社会问题、文化传统等方面的恶意“唱衰”、攻击污蔑、造谣抹黑，要敢于亮剑，不能客气，要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²这一主流观点，说明中国官方对美国的政治警惕性和反制措施正在增强。

（三）经贸关系中的政治障碍增加，“压舱石”的作用减轻

一方面，近年来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维持了高速增长，而且仍然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相互投资的政治阻力也增加了。美方抱怨中国的金融业和服务业市场很难进入，中国不断给国有企业输血、加强自主创新产业、限制采购外国技术产品，构成了对美国在华企业和产品的歧视；中国向多家外国企业发起了腐败调查、操纵价格指控和由官方媒体领头的抨击行动；美方还指控中国企业（主要是国企）在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下，通过网络窃取美国技术和商业机密，

1 [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林华、杨韵琴、朱敬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508—509页。英文原文见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1, p. 520.

2 参见《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谈认真学习贯彻习总书记在接见全军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代表时的重要指示》《解放军报》社论，2013年11月10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要敢于亮剑》，《北京日报》评论员文章，2013年9月2日。